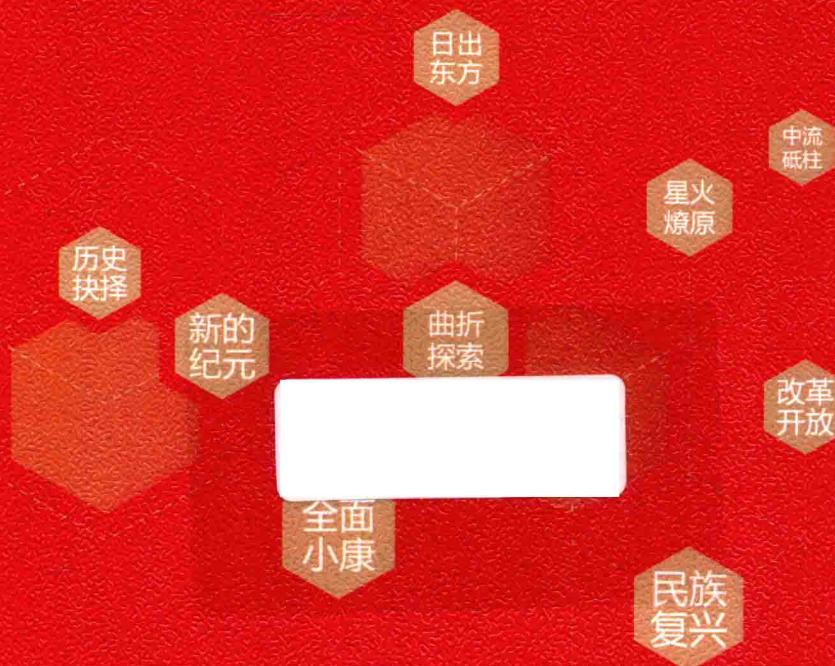


党员学党史

中国共产党历史

简明读本 [1921-2016]

张士义 @著



红旗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历史

简明读本 [1921-2016]

张士义 ◎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历史简明读本：1921—2016 / 张士义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2017.4（2017.9重印）

ISBN 978-7-5051-4188-9

I . ①中… II . ①张… III .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
1921-2016 — 学习参考资料 IV . ①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8935号

书 名 中国共产党历史简明读本：1921—2016

著 者 张士义

出 品 人 高海浩

责 任 编 辑 廖晓文 封面设计 张 栋

责 任 校 对 邢 梅 印 务 李先珍

出 版 发 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邮 政 编 码 100727 编辑部 010-51631925

E-mail hongqi1608@126.com

发 行 部 010-57270296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36 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051-4188-9 定 价 49.00 元

欢迎品牌畅销书项目合作

联系电话：010-57274627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C 目录 CONTENTS

一、日出东方	1
长夜难明	1
辛亥之变	4
五四曙光	7
红色起点	12
工运烈火	15
二、革命洪流	20
国共携手	20
南粤烽火	23
五卅风暴	26
北伐凯歌	30
血雨腥风	32
三、星火燎原	37
生死抉择	37
走向复兴	40

峥嵘岁月	44
红色中华	47
遭遇挫折	51
万水千山	55
共赴国难	58
四、中流砥柱	64
血肉长城	64
团结抗战	71
巩固阵地	77
光辉旗帜	81
胜利乐章	84
五、历史抉择	87
和战之间	87
奋起自卫	92
转入进攻	95
第二条战线	99
战略决战	102
革命到底	106
筹备建国	109
六、新的纪元	113
开国奠基	113
抗美援朝	119
厘定方针	122
七、过渡时期	129
酝酿过渡	129
保驾护航	133
三大改造	138
八、曲折探索	145
良好开端	145
巨大曲折	150

全面调整	156
两个趋向	161
九、“文革”内乱	168
发动“文革”	168
林彪之死	174
文革结束	177
严重危害	181
十、徘徊前进	186
“两个凡是”	186
历史转折	189
十一、改革开放	193
拨乱反正	193
改革起步	199
全面改革	205
治理整顿	213
十二、市场经济	221
明确目标	221
宏观调控	226
发展战略	231
加快发展	234
祖国统一	239
跨越世纪	243
十三、全面小康	252
辉煌成就	252
奋斗纲领	254
科学发展	257
和谐社会	259
党的建设	262
小康新貌	265
破浪前进	268

领导核心	274
宏伟蓝图	276
十四、民族复兴	280
百年目标	280
从严治党	284
外交新局	288
发展成就	293
决胜小康	299

一、日出东方

■长夜难明

中国是在 19 世纪中叶进入近代社会的。在此之前，中国是一个以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在历史上，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文明，随着岁月的流逝都相继衰落、中断或变异了。唯有华夏文明虽经曲折却从未中断，并不断创造出繁荣昌盛的局面。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令世人惊叹不已的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对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然而，当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陶醉于泱泱大国的“康乾盛世”之时，却万万不曾料到，比“大清帝国”大得多的世界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 17 世纪中叶开始，世界之舟顺着弯曲的历史长河驶进了近代港湾。18 世纪 60 年代以后，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在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

翻开这个时期的世界历史画卷，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番景象：当这些国家的蒸汽机在工厂里轰鸣作响，汽船在内河上劈波斩浪，火车在原野上呼啸奔驰时，曾经创造古代灿烂文明的中国却依然是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原来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此时已远远跑在了闭关锁国的中国的前面。

历史是无情的。一方生机勃勃，一方苟延残喘，这种反差极大的对比是令人痛的。为什么中国会由盛转衰、渐渐落伍了呢？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制度，阻滞了中国历史车轮的前行。由这个制度构架的中国社会，日益走向了衰败和落后。

衰败源于腐朽，落后就要挨打。1840 年，英国侵略军为维护其肮脏的鸦片贸易，以坚船利炮冲开了中国长矛大刀筑起的海防，耀武扬威地开进了这个闭关

锁国的东方古国的大门。鸦片战争的结局是正在走向腐朽没落的中国战败，清朝政府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自那时起，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不断发动侵华战争。每一次的入侵，都使中国山河破碎；每一次战争，都使中国人民生灵涂炭。屡吃败仗的清王朝统治者被迫同西方列强订立了一系列割地、赔款、让权的屈辱卖国条约。尽管中国在形式上还保持着独立，但实际上已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逐渐形成了被西方列强共同宰割的局面。在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没落面前，外国侵略者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他们在中国强行划分势力范围，不仅取得了在中国设立工厂、开采矿山、修筑铁路、设立银行、经理航运等特权，而且取得了驻扎军队、设立租界、领事裁判等特权。这样，外国侵略者既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也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大权，俨然成了“大清帝国”统治者的太上皇。这样，中国就逐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马克思早已精辟地说过：“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面对着大门洞开的中国这块肥肉，眼看着哗哗流入腰包的白银，贪婪的外国资本家喜出望外，头脑也变得发昏了。英国西菲尔特一家公司运来大批刀叉，准备供给习惯于用筷子的中国人进餐之用，结果刀叉在商店里陈列多年，无人问津。英国伦敦一家公司运来大批钢琴，设想在有几亿人口的中国，如果每200个妇女中有一个愿学钢琴者，那将是多么大的一笔买卖呀！其结果钢琴被堆在仓库里，任凭它受潮变质。

这两个近乎荒唐的故事，分明昭示了外国侵略者对地大物博的中国垂涎已久的目的。他们来中国，不是领略东方古国的风情，更不是旨在传播资本主义文明，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外国资本的侵入虽然促使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新因素，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导致中国建立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此同时，封建剥削制度不但依旧得以延续，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封建主义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

中国人民本来已饱受本国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又受到外来侵略势力的掠夺和奴役，无异于雪上加霜。自那时起，近代中国一步步由封建社会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沦落到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境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林则徐虎门销烟，严复发出“救亡”的呐喊，魏源幻想“师夷长

技以制夷”，洋务派力图“求强”“求富”……地主阶级内部的这一切努力，并不能挽救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大清王朝。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中华民族就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解决独立、民主、富强的问题，便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也就是说，救亡和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的两大问题。

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1]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华民族的同仇敌忾。一向富于斗争精神的中华民族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面前从未屈服过，几代仁人志士为捍卫民族尊严和争取国家独立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由于这些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因此它们的性质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我们把这种革命称作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区别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但是，谁来铲除横亘在中华民族前进道路上的几座大山，拯民众于水火，救国家于危亡呢？在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较晚，资产阶级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担当起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在19世纪后半期，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轮番上阵，都充当过反抗斗争的主角。

中国农民最早成为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斗争的主力。从三元里抗英到太平天国战争，血与火的抗争，生与死的较量，悲壮且悲愤。尤其是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达到了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驰骋14年，纵横18个省，极大地冲击和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抗争精神，但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农民毕竟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不可能提出代表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纲领。他们的斗争往往要依靠宗教的力量，不可能组成起领导作用的政党。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斗争将最终归于失败。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2页。

农民斗争没有阻止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和灭亡的直接威胁。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堂堂“天朝大国”惨败于东洋岛国日本，洋务运动中崛起的新式海陆军迅速溃败，中日《马关条约》使中国人蒙受台湾省被割弃、赔款2.3亿两白银等巨大损失。在这样的奇耻大辱面前，中国人只有再次奋起，救亡图存。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在《救亡决论》一文中，第一次喊出“救亡”的口号，奏响了此后中华民族前赴后继的斗争的主旋律。

甲午战火硝烟未尽，各帝国主义国家又掀起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面对国将不国的危急境况，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斗争中崭露头角。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变法图强”奔走呼号，发起维新运动，企图在不变动现政权和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对社会积弊修修补补。这场运动只坚持了103天，终亦不为统治者所容而流产。尽管“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有“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迈，但最终带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哀叹，空洒一腔爱国热血。谭嗣同悲愤的慨叹，代表了资产阶级改良派难逃失败命运的苍凉结局。

以上这些斗争，同属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是，这些斗争最终都失败了。它们的失败证明，农民、资产阶级改良派都不可能担当起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虽然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在客观上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最终也失败了。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武装侵占中国的首都北京，第二年清朝政府又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人不得不再次蒙受巨大的民族耻辱。

当人类进入20世纪的时候，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幅濒临毁灭的悲惨黯淡的前景：帝国主义列强恣意横行，灭亡中国的野心路人皆知；清朝政府昏庸腐朽，“洋人的朝廷”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洋人固然可憎，洋人的朝廷同样令人可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从痛苦的教训中得出结论：中华民族要生存，中国要发展，必须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

■ 辛亥之变

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斗争失败后，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加剧了。伴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社会内部初步成长起新的社会力量，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时，由于无产

阶级还很弱小，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即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大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对象，只有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

进入 20 世纪后，中国人在进行了各种不成功的反抗之后，只有起来革命一条路了。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后，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 1894 年创立兴中会时，就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振奋人心的口号。1905 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了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和以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纲领。同盟会的誓词写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指明了近代中国急需解决的三个根本性问题。孙中山宣传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在人们面前树立起一种新的目标。从这时候起，中国人民开始自觉地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斗争。孙中山察觉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某些弊端，认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1]。他受西方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企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不管他主观上怎么设想，按照他的“平均地权”主张实行起来，客观上仍只能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觉悟到改良无异于与虎谋皮，从而摒弃温文尔雅的改良之途，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纲领。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2]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了。由于这一年是中国的辛亥年，所以由此引发的这场革命被称作“辛亥革命”。1912 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建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它的意义首先在于打乱了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后来由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可看做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辛亥革命的意义还在于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试想，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被推翻，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

[1]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88、289 页。

[2]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63 页。

以打破？于是，中国人从这个事实中产生了信心：人民可以推动历史前进，中国的命运并不是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任意摆布的。思想的闸门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虽然依旧黑暗，但中国人民很快又鼓起勇气，重新开始斗争，先进的人们带着憧憬，继续寻找革命道路，勇敢地向前迈进，不正说明了这场革命的重大作用吗？辛亥革命的成功，证明帝国主义列强毕竟不能任意地支配中国的命运。

从这些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它是 20 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历史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中华民族在 20 世纪的一位伟大人物。

那时的中国人着实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沉醉和狂欢了一阵子，但是，现实让他们很快地失望了。“大清帝国”的黄龙旗飘落了，中华民国的五色旗升起了，但封建统治的基础却依然根深蒂固。夹缝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从娘胎里就带来了软弱性，他们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土崩瓦解之后，竟然迷惘踌躇，止步不前。于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下，南京临时政府昙花一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转瞬间落到了前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手中。从此，北洋军阀代替了清朝王室，水深火热换成了火热水深。袁世凯上台之后，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政府。在这种局面下，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家愈发贫弱，百姓更加陷入苦难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

辛亥革命最后以“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结局而告失败。严酷的现实说明，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旧在煎熬中痛苦地挣扎。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1]

辛亥革命为什么最后归于这样的结局呢？究其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太软弱。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广大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这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能力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热切地期望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蹂躏，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但又十分害怕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小心翼翼地试图不正面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同样，他们憎恶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但又以为只要把民主共

[1] 《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99 页。

和国的政体建立起来，各种问题便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根本不想也不敢触动中国封建势力的庞大经济基础，更不可能发动农民在农村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大变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它在这场革命中，必然不能提出明确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必然脱离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必然形不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农民斗争、资产阶级改良以至资产阶级革命，各种惊心动魄的斗争，都相继画上了痛苦的句号。一次次地反抗都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为此饮恨黄泉，许多活下来的人仰望苍天。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

■五四曙光

旧路走不通，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于是，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之中。而新文化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

辛亥革命之后，一个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痛定思痛，苦苦思索着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那时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不足以救中国，还要有新的觉悟，欲救国，必先启蒙。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于9月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的风暴。

新文化运动初期，思想家们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思考，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除陈腐学说之囹圄”^[1]。他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他们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封建礼教提出了全面的挑战。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生气勃勃的、进步的思想解放的潮流。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在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据这个口号的倡导者陈独秀解释，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科学除狭义的自然科学外，还指广义的社会科学，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这场启蒙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传播和接受适合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

[1] 李大钊：《青春》，《李大钊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

新思潮创造了条件。

那时的许多人认为，中国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强盛，就得走西方文明之路。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1]。这表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

当中国人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它让世人领略了战争的残酷；一件是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宣告了中国的北方邻国——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

这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对中国先进分子的震撼同样是巨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于冲破封建主义的思想牢笼，确曾起过进步作用。但是，到20世纪初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日益暴露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就引起了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正是这种怀疑，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的新途径，去寻找新的挽救中国的思想武器，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不仅唤醒了西方的无产阶级，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俄国地大人多，经济文化落后，国情与中国有许多近似之处，这就不能不对中国的先进分子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个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民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给中国的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他们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这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也逐渐成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与此相联系，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个阶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

[1] 陈独秀：《宪法与礼教》，《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8页。

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同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具有顽强不息的斗争精神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它又比农民更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具有更开阔的眼光。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最进步、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这个阶级的成长，就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另外，这时还形成了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了的阵营。在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这场新的人民大革命，是以 1919 年 5 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历史起点的。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 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会议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竟然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 3000 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集会。他们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由此掀起的学生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一度转入低潮。从 6 月 3 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大批学生被捕。

正在这时，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 6 月 5 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约六七万人。随后，北京等地的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展到 20 多个省市 100 多个城市。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了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一些地方的农民也参加了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迫于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于 6 月 10 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6 月 27 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终于未敢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以实现。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的过程，以前所未有的彻底程度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这种揭露不仅仅限于日本，而且也包括对英、美等国。由于这个原因，

就从根本上使人们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走上反对帝国主义的道路。同时，五四运动给予中国封建势力以极大打击，造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革命形势。五四运动的直接打击对象是北洋军阀政府，而这个政府实质上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五四运动以其广泛的群众性向封建统治势力宣战，比起此前的革命运动对封建势力的忍让、退却，就大不一样了。

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人们从五四运动高潮的兴奋和激动中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思考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于是，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为人所注意，以至流行一时。但当时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在报纸杂志上纷然杂陈。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主义流派，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经过反复的比较和鉴别，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聚集在一起，结成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

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起着主要的作用。1919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杨匏安、李达等几位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胡适于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在同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强调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并“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2]。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

苏维埃俄国政府曾于1919年7月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于1920年四五月间在《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巴黎和会与苏俄宣言，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前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愤慨，后者则引起中国人民的惊喜。一些曾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抱有幻想的人，从这种对比中放弃了原来的迷恋。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有力的推动。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队伍。

[1] 该文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6号上。第5号标明出版日期是1919年5月1日，实际上拖到9月才与读者见面。

[2]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